

吴莉莉后来的故事

(接上一期)后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,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。征得毛同意后,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。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,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。

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,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。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。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,一整天,有时吃饭也在这里。他们海阔天空,无所不谈,从革命,抗日,苏联、美国、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,英国诗人济慈的诗……毛是个诗人,文学家,浪漫主义者。“精神上十分寂寞和孤独”,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,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……

作为翻译和舞伴,她和毛泽东就这样相识了,很快两个人就恋爱了,双双堕入爱河,并且打得火热。

这件事自然瞒不过贺子珍的眼睛。有天半夜,毛主席来到吴莉莉的窑洞。贺子珍跟踪而来,这下可捅了大漏子。

据史沫特莱说,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,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门前响起了熟悉的毛的脚步声。接着,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。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,看见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。贺子珍站在一边,对毛大叫大喊,毛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,然后给了她一记耳光,要她停止。于是,贺子珍冲向缩在墙角的吴莉莉,一把抓住她的头发,用手指甲抠她的脸。史沫特莱过来

干预,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,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,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。史沫特莱反驳她,说她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,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。这时,还有另一种说法,说愤怒欲狂的贺子珍拔出手枪,要射杀吴和毛(此事只是当事人吴莉莉所说,史沫特莱并未提及,故史料不全,难以确定)。此时史沫特莱指责贺子珍说,你出于疑心和嫉妒而攻击革命领袖,犯下了反革命罪行。最后只好由毛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。一路上都有人偷偷观看,议论纷纷。

吴莉莉被送出延安内幕

这件事发生后,毛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,很快就把她途经西安送往苏联,治疗“精神病”。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,被强行送往西安。这里有两种说法: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,毛当时也无法违抗,只能在临别时,温柔地捧着吴的双颊,充满柔情地说:你是好女人,但不适合搞政治……二人洒泪而别;另一说法是: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,危害极大,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走了吴莉莉,把她送往西安,不让她再和毛见面。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,自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,拘捕了她。但在此时,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,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。把她救了出来,两个人结了婚。

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,但感情一直不好,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。他

的夫妻关系很奇怪:虽然在人们面前,夫妻二人卿卿我我,亲密和谐。但是一关上家门,就形同路人,谁也不再理谁。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两个歌女鬼混,吴莉莉也不闻不问,置若罔闻。

吴莉莉一九四九年从成都去台湾

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。往往在吃饭时,她会站起身来,举杯高呼:“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!”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。

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(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,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)闲谈,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,一谈起“北方的那位伟人”竟然泣不成声,连手中的烟卷熄灭了,烟灰落在白缎子旗袍上都不知道。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。

一九四九年“解放”前夕,张研田一家在成都,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,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,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,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,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,有一天,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,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,她虽然竭力挣扎,哭哭啼啼,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,送到了台湾。但是,吴莉莉在张家却留下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,其中就装着毛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《聊斋志异》。

毛送了四十多封情书给吴

毛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,可能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。就是

在吴到了西安之后,他还不断派专人去西安,前后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。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最爱读的线装书《聊斋志异》,封面上亲笔题词:“润之赠吴莉莉”。据说,吴莉莉离开延安后,毛十分痛苦,有很长一段时期,心情不好,郁郁寡欢。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,取代了吴莉莉,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。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,结下了个人恩怨。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。

“解放”后,毛专门派人来找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,把那些书信收走了,并严词警告:“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!”

雷锦章很喜爱毛的那些情诗,曾悄悄抄录了一份,把它们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《聊斋志异》深藏了起来。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,印象颇深,便向母亲索取,但雷锦章怕他惹事,只是答应,将来他长大了,可以把这些东西遗留给他。可惜经过“文革”和各种动乱事变,这些珍贵的革命爱情文物早已不知去向。

我听了父亲的这段述说,当时心中很以为然。我确信吴莉莉和毛主席谈过恋爱这是事实。但说是因为周恩来把吴赶走,并由此结下毛、周之间的个人恩怨,以至“解放”后毛不断地整周,我不相信。我认为这件事肯定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,而毛批判周,是出于政治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。一个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”怎能为人情爱而和亲密战友结下死仇呢?另外,如果假设当初毛泽东和

吴莉莉结了婚,吴当了“第一夫人”,就因为她曾留学美国,比较亲美,就会影响到毛泽东不会搞亲苏的“一边倒”和抗美援朝运动?简直是荒诞不经。

我当时就和父亲争论起来,说他这完全是唯心史观,世界观没有改造好。

父亲感叹道:“你小孩子,懂得甚么?”

“我都三十多岁了,经过这么些年党的教育,我是个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。”

父亲苦笑说:“再没说话。”

吴莉莉与丈夫张研田的下落 一九九二年,我随中国电视艺术团代表团访问台湾,曾托我在台湾的表弟陈良打听张研田夫妇的下落。在“文革”时期,我有一次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看到一个消息,提到张研田是当时台湾驻日的“亚东关系协会”理事长。

后来,表弟陈良告诉我:张家人丁凋零。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,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;女儿张小菲现在在美国,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;吴莉莉的死,好像是在毛逝世的前一年,她今天如果还活着,应该有九十六岁了。

回过头来,再看这段历史,不知为甚么,我忽然觉得当初父亲的看法,不无道理。

(注:贺子珍大闹窑洞,是否要用枪击毛与吴这一情节,系吴本人所言,恐为片面之词,为准确起见,建议读者参阅彼得·兰德的《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》,李辉、应红译。北京,文化艺术出版社,二〇〇一年。)

哪位民国陆军上将从未上过战场却被称之为“军神”?

蒋百里(1882-1938年),原名蒋方震,字百里,浙江海宁人,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岳父,民国陆军上将,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、军事教育家。家学渊源,早年时代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,国学深厚。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失败深深刺通了他,经常手捧《普天忠愤集》挑灯夜读,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,泪如雨下,立誓为国效命。1898年戊戌变法时考中秀才,受维新思想影响,饥渴地阅读新书。1900年到杭州求是书院(浙江大学前身)深造,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。翌年东渡扶桑,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(此前在成城初级军事学堂),光绪卅一年(1905)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;与蔡锷、张孝准并称为“中国三杰”,日后三人都成为非凡人物。

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,大多思想激进,倾向革命。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,并组织“浙江同乡会”,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月刊《浙江潮》,影响甚大,鲁迅、章太炎等人亦为其撰稿。蒋氏自己所写的《发刊词》、《国魂篇》、《民族主义论》等文,宣扬民主革命,提倡民族精神,立论独到,条理清晰,文辞流畅,感情奔放,颇类梁启超文笔;而他倾向革命,又不同于梁氏的改良主义,颇受读者注意。(因在此期间蒋氏结识了戊戌后亡命东瀛的梁氏,并执弟子礼。)

1906年,蒋百里应满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所聘,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,筹建新军。赵曾专折奏保蒋氏为“特异人才,可以大用”。随后被公派至德国研习军事,成为兴登堡将军(后为德

国总统)下属连长。1910年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,在沈阳“以二品顶戴任用”。这一年他不过28岁,但在同龄人中已锋芒毕露,声望无两。1911年武昌起义后潜回南方,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。民国成立,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。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首任校长,学生中有未来名将白崇禧、陈铭枢、唐生智、方声涛、刘文岛、张治中、陈诚等。斯时便已与广东李浴日、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,驰名海内外。

1913年6月18日,在保定军校,凌晨5点,天刚灰亮,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。他身着黄呢军服,腰挂长柄佩刀,足蹬锃亮马靴,站在尚武堂石阶上,一脸沉痛:“初到本校我曾宣誓,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,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。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,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。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……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!”

随后,蒋百里竟掏出手枪,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了一枪。

奇人必有奇运,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,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;后者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,改名蒋左梅,并于其祖国彻底决裂。

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,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,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,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及政界之绝望。不论何种说法都只能部分成立。蒋氏自杀,最大原因是他的骄傲。自杀者往往是最骄傲者,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。

同年蒋百里兼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。1916年袁氏称帝,

蒋氏入川佐老同学蔡锷讨袁。袁氏死后,又陪蔡氏去日本就医,旋即为之料理丧事。1917年回国,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,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《孙子新释》、《军事常识》等,出版后成为保定军校教材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,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。次年春回国,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,一时如风起云涌。梁氏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,决心放弃政治生涯,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。蒋氏积极参与,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,号称“智囊”。他不仅出主意,更著书立说,主持“读书俱乐部”、“共学社”等团体,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战将之一。

1920年蒋百里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,参与浙江、湖南省宪起草工作,支持“联省自治”;又主编《改造》杂志,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。期间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;毛泽东当时也致力倡导“湖南省自治”,也许正是受其影响。

次年,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;梁启超为之作序,下笔不能自休,竟写了5万多字,跟原书的字数差不多了,只好另作短序。后来梁氏将这篇长序改写、充实,取名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反过来又请蒋氏作序——此事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。

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,文艺精神奋发,同胡适组织新月社,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。几年后蒋氏被蒋介石关进监狱,感情充沛、容易激动的徐氏还背起铺盖,喊着要进去陪他一同坐牢。

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,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;因吴不“讨奉”而辞职,去上海投孙传芳。1929年支持湘军将领唐生智起

兵“倒蒋”(蒋百里曾劝说唐氏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),翌年入狱;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。1933年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考察,便很早就预知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,拟定多种国防计划,呼吁国民政府备战。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。来年赴欧美考察,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(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,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他)。1937年9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、德等国,回国后发表《日本人》及《抗战基本观念》,断定日本必败,中国必胜。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。

蒋百里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,但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。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,他于1937年编著的《国防论》出版后曾轰动一时,书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,成为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,在日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白崇禧等多人。在这部让他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,老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:“万语千言,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,中国是有办法的!”八年抗战的战场上,无数蒋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、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,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。

有人说,蒋百里“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,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。……有两个蒋百里,一个文人的蒋百里,爱结社、写文章、交名流;一个军人的蒋百里,终身梦想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。到最后,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,虽然,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”。

蒋百里的主要军事战略观点是:第一,用空间换时间,“胜也罢,负也罢,就是不要和它讲和”;第二,不畏鲸吞,只怕蚕食,全面抗战;第三,开战上海,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,阻日军到第二棱线(湖南)形成对峙,形成长期战场。他还犀利指出,中国不是工业国,是农业国。对工业国,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,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,大阪就是半个日本。但对农业国,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,农业国是松散的,没有要害可抓。所以,他的结论是: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,打持久战。

但遗憾的是,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。同年11月4日,在迁校途中,他病逝于广西宜山。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,称之为“军神”。

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,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,他先后被梁启超、胡适、赵尔巽、段祺瑞、袁世凯、蔡锷、黎元洪、吴佩孚、孙传芳、唐生智、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顾问、同道,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,颠沛于诸侯。他的盖棺定位,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。《大公报》总编辑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,或者曹聚仁的《蒋百里评传》,都审慎地使用了“军事学家”一词。王氏说:“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,他未曾典兵,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;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,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。”在“老虎总长”章士钊的挽诗里,却说他“谈兵稍带儒酸气,入世偏留狷介风”。黄任之的挽联则相对客气一点:“天生兵学家,亦是天生文学家。”